

“大锅饭”

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罗平汉

著

“乌托邦”的公共食堂

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过集体生活。

“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

共产主义似乎就在眼前。



红薯秧、高粱秆、小球藻、叶蛋白、人造肉精、吃饭大会、粮食增量法，这一个个让60年代初的人们熟悉，却使今天的年轻人陌生的名词，刻录了一个充满激情又戏剧化的年代，让我们回看那段特殊的年月，重新审视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衰。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大锅饭”

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罗平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锅饭”: 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 罗平汉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220-09330-2

I. ①大… II. ①罗… III. ①农村—公共食堂—史料
—中国—1958~1961 IV. ①D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9523 号

DAGUOFAN NONGCUN GONGGONG SHITANG SHIMO

“大锅饭”: 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罗平汉 著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 //www. scpph. com](http://www.scpph.com)
[sichuanrmcbs@sina. com](mailto:sichuan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028) 86259457 86259453
(028) 86259457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55mm×230mm
18. 75
230 千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9330-2
39. 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前 言

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涌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当时，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对其大唱赞歌，总结出了众多的“优越性”，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农民自此就可以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而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员的不满而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

千百年来一向生活散漫惯了的农民，一夜之间来到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的确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改变。吃饭方式与社会制度之间，本没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农民是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公共食堂吃饭，充其

量也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公共食堂也就被赋予了“社会主义阵地”的特殊意义。凡是坚持办公共食堂，就认为是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之，谁要是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就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然而，庐山会议后办起的公共食堂却生不逢时。1959年开始，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几年，全国粮食大幅度减产，城镇人口却大幅度增加，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国家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使得农民的口粮一减再减。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还硬要去巩固公共食堂这块所谓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困难的程度和农民生活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在吃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亏，连续过了几年紧日子后，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此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个的调查组深入农村，从而看到了从以前各种汇报材料中看不到的真实情况，听到了群众要求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呼声，各级干部也深切地感受到公共食堂问题的严重性。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顺应民意，作出了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农民自愿的决定，公共食堂也因此得以解散。从此，吃了3年多大锅饭的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自己做饭吃的权利，这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笔者出生的时候，公共食堂已经解散，没有赶上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不过从小就听父辈们讲吃公共食堂的种种难处和苦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上小学的时候，还流行忆苦思甜，许多人可能听到过这样的笑

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忆旧社会的苦时，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吃公共食堂的日子如何如何，弄得主持者哭笑不得。

时下学术界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著述应该说已颇为不少，但对于农村公共食堂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笔者为此收集了若干材料，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来龙去脉作了简单的勾勒和客观的描述。

目 录

一、初 澜	001
1.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 /001	
2. “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 /009	
3. “这件事要提倡” /014	
二、大 潮	020
1. “人民公社好” /020	
2. “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 /027	
3. “大锅饭”的“优越性” /034	
三、“吃饭不要钱”	046
1. “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 /046	
2.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053	
3. “粮食多了怎么办” /059	
4. “放开肚皮吃饭” /069	

四、“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079

1. “乌托邦”里的公共食堂/079
2. “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088
3. “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 /095

五、政策调整 105

1. 停伙的食堂/105
2. “解散食堂，可以解决许多矛盾” /112
3. 积极办好，自愿参加/127
4. “吃饭不要钱，实际把人钳” /132

六、庐山顶上话食堂 138

1. “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 /138
2. “神仙”们的议论/143
3. “合乎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 /147

七、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156

1.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156
2. 反右倾，办食堂/164
3. 贵州、河南“经验” /168
4. 劳而无益的办法/177
5. 生存危机/182

八、艰难的维持..... 204

1. 粮食增量法/204
2. 代食品/213
3. 吃饭大会/227

九、顺应民心，解散食堂..... 233

1. “农业六十条” /233
2.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 /249
3. 不约而同的结论/268
4. 供给制出懒汉/280
5. 农村公共食堂历史的终结/286

一、初 澜

1.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

1958年夏秋间公共食堂的大量涌现，固然是与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联系在一起的，但农村公共食堂的产生，却要早于人民公社的建立。

中国农民早就有农忙时集体做饭吃的习惯。还在互助组时期，农忙时节便出现了吃“转转饭”，即在谁家干活就在谁家吃饭，有时也由几家凑米凑菜一起做饭吃，这样便于早出工，出工齐，提高生产效率。

进入农业合作社后，由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增加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加之农业合作社实行集体劳动，在农忙季节人手紧张时，有的农业社便开始全社集体做饭，然后统一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或在做饭的地点集体就餐，由此产生了农忙食堂。

湖北省京山县的八一农业社，从1955年起就办起了农忙食堂。这年4月大农忙的时候，该社的彭德喜互助组（当时农业社还未建立），13个社员要耕种110亩田地，感到劳动力不够。有人提议说，集体吃饭，出工整齐，能够多干活。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借了

社员刘青芝家的一间房子，集资买了一口锅，其他社员凑了一些刀、筷、碗、瓢，办起了食堂。这个食堂办了两季，即夏收一季，秋收一季，农忙过后，还是各自回家起伙。^①

农忙食堂是临时性的，长的个把月，短的几天、十几天。也有少数的农忙食堂办起来后一直坚持下来变成常年食堂。湖北省京山县八区合作乡，荆门县东平乡、马平乡，都有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办起，并一直坚持下来的食堂。荆门县的高店乡1957年曾办起了240个农忙食堂，该乡的茶新社还办了5个常年食堂。^②从合伙做饭到农忙食堂，由农忙食堂到少数常年食堂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建立前就已产生，当时的确是出于群众自愿而办起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不过，这种群众自觉自愿办起的食堂，其实质只不过是合伙做饭的相对固定化，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食堂是有根本区别的。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要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要发展畜牧业，改良农具，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防止和消灭病虫害等。会上，毛泽东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

① 中共京山县委：《群众要办的公共食堂》，《七一》1959年第8期。

② 梁久让：《让农村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七一》1958年第2期。

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泄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气”。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揭开了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0月25日，“农业四十条”公开发表。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将纲要交给全体农民讨论，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也就是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特别是“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社论要求农村干部群众打破“生产已经到顶了”的保守思想，在低产地区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高产地区继续发挥潜力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在今冬明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业建设的高潮，使“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报刊上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出现“跃进”一词，正式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11月1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对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社论说，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以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毛泽东对这篇社论非常欣赏，认为“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实。他为此亲笔写了一

则批语：“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①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其中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由于这些社论的发表，反冒进就成了右倾保守的同义词，而右倾保守意味着消极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于是谁也不敢再提倡反冒进了，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保守倡跃进即冒进的强大舆论氛围，一步步地将“大跃进”发动起来。在此前的1957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鼓起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的那种劲头来，掀起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的生产高潮。是年11月和12月，各省、市、自治区为了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组织和发动“大跃进”。

1957年底，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一批中小型水利工程开始动工。由于这些工程已超出了社、乡的界限，需要集中众多的劳动力进行所谓大兵团作战，并且吃住在工地，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公共食堂也就顺时而生。河北省的徐水县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徐水是一个只有 31 万人口的小县，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足 10 万人。在 1957 年至 1958 年冬春之际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支“平时 10 万人，多时 13 万（指整半劳力）”的劳动大军。其办法是打破社界、乡界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中共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并组织了随营食堂。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

当时，徐水和全国一样，农业方面除了兴修水利外，还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养猪积肥。仅深翻土地一项，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毛泽东曾是深翻土地的积极提倡者。还在 1957 年 10 月，他就看到了一份关于山东莒南县厉家寨乡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夺取农业丰收的材料，其中介绍说，深翻和整地是这个山区农业社增产的主要关键之一，深翻地比未深翻地每亩增产 50 至 70 斤。这一点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成都会议上，他曾说，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以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次。山东莒（南）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这年 4 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华东和中南两地区的省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他又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一亩地宁可花几百个工也使得。在这年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共河南长葛县委书记吕炳光作了《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八百斤》的发言，介绍了该县深翻土地的经验。发言中说：“深翻土地是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深翻土地才更能充分地发挥水利和肥料的增产效能”。发言还介绍

了长葛组织群众性深翻土地运动的经验，并详尽地介绍了几种深翻土地的方法。这个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在5月17日的讲话中说，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一年把112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遍，争取亩产800斤。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个别地方深翻土地或许能够增产，对全国并不见得都有效。但是，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下，凡是毛泽东倡导的，各地哪有不雷厉风行执行之理，而且一些地方对深翻土地片面理解，以为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竟翻有一丈多深。积肥也是越积越走样，有的地方在一亩地上施上万担的肥。这一切自然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本已不足的劳动力更显紧张。

徐水也是如此，过去翻一亩地用工只需10个左右，由于搞深翻，此时需用工40个左右。如此大的用工缺口，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以往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投入农业生产。恰在此时，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在听取代表发言时，得知有的地方已经办起了公共食堂，大受启发，立即给县里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徐水县委马上召开会议，对办食堂进行具体研究，认为办食堂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办法，也是实现生产大跃进的有效措施，乃决定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同时大办食堂，尽快实现全县食堂化。在此之前，徐水农民曾自发地办过一些食堂，但只限于单身汉参加。当然，这不包括早已办起的所谓“随营食堂”。

1958年7月初，中共徐水县委发出《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指示》，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口号。与此相配合，徐水县委提出要实现全县食堂化，并将之作为推动劳动大协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

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四次电话会议，“交流了办食堂的经验”，还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地推向了高潮”。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 20 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徐水全县很快建立公共食堂 1777 个，在食堂吃饭的有 28.5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85% 以上。此外，还分别建立了“野外战斗随营食堂”1410 处，幼儿食堂 119 处，老年食堂 248 处。这样，徐水全县很快实现了食堂化。^①

据《徐水报》报道，徐水食堂的组织形式有这几种类型：一种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建立野战食堂、综合食堂、幼儿食堂、老年食堂；一种是按粮食指标划分食堂，到底怎么划分，该报没有详细介绍，所以不知其详；一种是以户为基础，以连为单位，不分幼、青、老，按一家计算，集体吃饭，也可以打回家去吃的食堂。^②

该县的南张丰乡在办食堂之初因不甚积极，受到县委的批评。接到县委批评电话的第二天，南张丰乡就建立了 92 个食堂，实现了全乡食堂化。《徐水报》特地介绍了该乡双营社管理食堂的几种办法：第一是认真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规定用粮标准，在不超过以前定量的留粮标准的原则下，根据社员的年龄大小和劳动强弱，除早晨和晚上吃稀饭不限量外，对中午吃干饭分为四等，即 1 至 3 岁 4 两，4 至 10 岁 8 两，11 岁至 16 岁 14 两，17 岁以上 1 斤 7 两（此处为老秤，16 两为 1 斤，下同）。另外，为了奖励社员个人节约，少吃一个馒头给 2 两粮票，作为

① 中共河北省徐水县委员会：《实现全县食堂化的几点经验》，《农村工作通讯》1958 年第 10 期。

② 《群策群力，办好食堂》，《徐水报》1958 年 7 月 25 日。

社员个人储备粮。第二是每月向社员公布一次账目，做到日清月结，便于社员对自己的伙食心中有数。第三是为了照顾社员亲友来往吃饭问题，规定社员可以把自己节余的粮票给客人在食堂吃饭。有病的社员食堂还设有病号饭。^①

徐水实现全县食堂化后，“每天节约 10 万个小时，以 10 小时为 1 个工作日计，等于每天增加 1 万个劳动日”。^② 该县县委介绍经验说，由于生活集体化，彻底解决了下地集合等齐的窝工现象，还便于支配劳动力，平均每人增加了 3 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该县南城农业社有 94 户，过去每户平均有一人因家务缠身不能参加生产，食堂建立后，只需 10 个人做饭，腾出了 84 名妇女劳力。由于吃饭及时，行动统一，又提高工时 753 个，就等于增加了 63 个劳动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县仅食堂化一项，就可解放劳动力 47119 名，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增加的工时，可折成劳动力 32000 个。^③

徐水县委所折算出的兴办公共食堂节约出来的劳动力，自然不可全信。要是果真能节约那么多的劳动力，无疑是“优越”无比。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大跃进”启动以来，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客观上要求更多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参加农业生产。伴随大办水利，县、社大办工业，以及随后出现的全民大办钢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去参加“野战兵团”，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确需要比以前有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办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等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① 《双营社办食堂的经验》，《徐水报》1958 年 7 月 8 日。

② 《全县妇女劳力大解放，行行业业出状元》，《徐水报》1958 年 7 月 8 日。

③ 《实现全县食堂化的几点经验》，《农村工作通讯》1958 年第 10 期。